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3.01.004

从扩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对外开放平台的演进与升级

崔庆波, 邓星, 关斯元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在“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经历了“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在政策取向上从扩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演进,在空间格局上从东部率先开放向东西协同开放进化,在主要功能上从单一(如出口加工区)向复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变和开放制度的演化,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还推动塑造了不同阶段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和以日韩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应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多区叠加和东西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深化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加快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强化对外开放平台以点带面的功能和优势。

关键词:对外开放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格局;国际经贸规则;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5.1;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3)01-0042-17

引用格式:崔庆波,邓星,关斯元.从扩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平台的演进与升级[J].西部论坛,2023,33(01):42-58.

CUI Qing-bo, DENG Xing, GUAN Si-yuan. From Expanding Exports to Institutional Opening: The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Opening-Up Platform Construction[J]. West Forum, 2023,33(01):42-58.

* 收稿日期:2022-12-20;修回日期:2023-01-15

基金项目: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人才专项(YNWR-QNBJ-2020-160);云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21YNUGSP034)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崔庆波(1981),男,云南宣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经济一体化研究;Tel:871-65033798;E-mail:cqbmail@126.com。邓星(1998),女,云南昭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E-mail:2367711495@qq.com。关斯元(1998),女,吉林吉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E-mail:1241332482@qq.com。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升级,从最初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工业,到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再到推动高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习近平,2022)^[1]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并首次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经济形势。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和高质量融入国际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外开放平台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对外开放平台主要包括各类旨在促进对外开放的小尺度特殊经济功能区,通常指通过政策赋能优先开放发展的经济区域,包括各类产业聚集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广义的对外开放平台除了各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外,还包括能够有效支撑国际经贸交流的区域发展载体和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如开放城市、城市群、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等。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进程,本文的分析在以狭义开放平台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兼顾广义开放平台的建设。

国内外研究都揭示了扩大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Balaguer et al, 2004)^[2]。Karunaratne(1980)的研究发现,在1973年,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的75%,显示出对外开放的强大带动力^[3]。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效仿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有效促进了国内分工融入国际分工(简新华,2022)^[4];提高了国内区际专业化分工水平,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突出作用,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陈传兴,2007)^[5];形成了出口驱动产出增加、产出增加进一步推动出口提升的良性循环(徐长生等,2008)^[6]。但也要看到,出口导向型战略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贸易大国的出口扩张型经济增长容易带来贸易条件恶化,损害开放福利,同时也会加剧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导致产业低端锁定(张鸿,2005)^[7],从而制约低水平开放条件下的福利改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国内需求,对外开放也模式亟待从规模和速度优先向质量和效益优先转变。尤其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为有效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逆全球化”的抬头、“脱钩断链”的威胁,我国亟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构建制度型开放体系,统筹好贸易发展和贸易安全。与此相适应,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和发展也需要转型升级。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对于对外开放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是早期对外开放平台的重要职能。1980年,我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迅速成为扩大出口、学习先进技术和和管理模式的窗口,并对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84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有效放大了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为后续其他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国家级战略平台是具有较强“造血”功能的稀缺性政策资源,其区域布局更能反映不同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关切(尹虹潘,2018)^[8],而对外开放平台是区域开放的重要载体,有助于经济外向度提升(徐唯燊,2021)^[9]。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有效提升了我国的开放水平,改善了区域营商环境,推动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制度创新(李滨,2015)^[10],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我国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主要对部分对外开放平台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估,但对其整体的演进历程及经济影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同时,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开放制度相适应和匹配的,其发展路径和演变方向取决于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和转换。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战略转换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历程及其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并结合对外开放的制度转变探讨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升级的方向和路径,进而为新时代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供政策启示。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

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环境的演变以及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导致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经历了明显的逻辑转换。周天勇等(2017)将这种转换过程分为“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出口升级替代”三个阶段^[11],苏科伍和马小利(2018)则将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分为“鼓励出口创汇,缓解技术落后”“技术引进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渠道”“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科技兴贸引领确立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四个阶段^[12]。虽然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主要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推进,但对改革开放前对外开放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缘由及其路径选择,因此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历程进行考察,并将其划分为“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高水平对外开放”三个阶段: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加快恢复在长期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出口以满足进口需求,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平台,极大提升了对外开放水平,崛起为“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该过程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得到体现(参见表1)。

表1 1952—2022年部分年份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

阶段	年份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主要特征
进口替代	1952	4.6	6.4	11.0	进口依存度持续下降,触及低点后转而回升
	1957	6.0	5.5	11.5	
	1962	5.1	3.7	8.8	
	1965	4.5	4.0	8.5	
	1970	2.9	2.9	5.9	
	1975	5.7	5.9	11.6	
	1978	5.6	6.2	11.8	

续表

阶 段	年份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主要特征
出口导向	1979	5.2	5.9	11.1	
	1982	7.9	6.9	14.3	
	1985	8.9	13.8	22.7	
	1990	15.8	13.6	29.4	进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
	1995	20.8	19.2	38.9	触及高点后转而回落
	2000	20.8	18.8	39.6	
	2007	34.6	27.1	61.7	
高水平对外开放	2012	22.4	25.1	42.3	
	2013	23.3	20.6	43.9	
	2015	20.6	15.2	35.8	
	2017	18.4	15.0	33.5	外贸依存度持续回调,触
	2019	17.4	14.5	32.0	及低点后转而上升
	2021	19.0	15.2	34.2	
	2022	19.8	15.0	34.8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其中,2022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再上新台阶》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1. 进口替代阶段(1949—1977年)

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机械自动化迅速发展,扩大了国家间的生产率差距,推动生产过程进一步分工,并导致国际分工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垂直分工为主。发展中国家大多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制成品,国际分工呈现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两极分化格局,这种产业间分工促使各国主要遵循要素禀赋差异开展产业间贸易。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工业发展滞后,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强调通过进口替代来加速工商业发展。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奖出限入,力求在通过出口获取进口所需外汇的同时,以扩大内需引领国家工业发展,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些政策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基础,主要通过关税控制进口规模,以国内生产替代国外进口,目标是通过“看得见的手”保护和培育具有市场潜力的幼稚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避免本国工商业在激烈竞争中失利。

事实上,进口替代战略是后进国家普遍采用的产业保护措施,对构建和保护本国产业体系具有积极意义,为国内产业的加快成长提供了空间。然而,进口替代政策也面临突出的成本问题,如何提升受保护产业的内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严峻挑战。一是在进口替代政策的作用下,国内产业往往存在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和产品质量提升缓慢等问题,不利于促进产业内涵式发展。二是进口替代政策挤压了发达国家的出口规模,可能加剧对外贸易摩擦。三是对于幼稚产业的选取、保护措施的选择以及保护周期的确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难题,进而对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及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形成挑战,也不利于通过国际市场增强企业出口能力。在进口替代阶段,我国外贸依存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经历了明显的下降及触底过程,国内生产参与国际分工有限。

2. 出口导向阶段(1978—2012年)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实现了从产业间垂直分工到产业内水平分工的转变(冯远,2007)^[13]。在发达国家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欠发达国家的背景下,为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我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规模。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后,丰富的劳动力和低廉的要素价格成为扩大出口的重要依托,为利用比较优势扩大工业产品出口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口导向战略主要采取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出口退税减税等方式,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以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推动经济发展,有效扩大了国内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获取了丰厚的规模经济红利,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内生产快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我国基于比较优势嵌入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取得突出成效,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产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并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提升。然而,比较优势的应用也是有限度的,过度依赖可能落入“比较优势陷阱”。首先,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推动工业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容易让企业满足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导致产业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地位难以有效提升。其次,过度依赖成本优势也容易导致贸易韧性不足。尤其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价格优势逐步削弱,我国面临来自后发国家的有力竞争。最后,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贸易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在出口导向政策刺激下,企业“拿来主义”盛行,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突出的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不利于构建安全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

3. 高水平对外开放阶段(2013年以后)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际分工从产业内分工进一步延伸至产品内部,推动产品按照不同工序和环节分工并进行全球化生产,为我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契机。改革开放后,我国嵌入国际市场取得卓著成效,但过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也面临低端锁定风险。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塑造动态比较优势,破解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附加值低和产业链低端锁定等问题,我国开始通过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推动劳动成本、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转换为产业体系完备、技术积累较好、超大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嵌入水平。当前,我国与绝大多数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与相对地位均呈上升趋势,且与2/3国家的产品内分工都以高端型分工为主(丁小义等,2022)^[14]。

近年来,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基础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尤其是制度型开放使得融入全球市场的方式和路径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我国当前加快制度型开放最前沿、最重要的试验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在开放性、灵活性、国际化方面的持续提升,正在深刻重塑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底层逻辑,为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工厂叠加人口大国、贸易大国的基本国情下,随着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逐步从粗放式的规模寻求型转变为内涵式的质量提升型,出口导向和出口竞争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风险累积将逐步消解,安全、稳健、优质、高效的中国生产、中国制造正逐步打破传统模式下的成本竞争困境,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也将持续提高。

三、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历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再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转换,改革开放后的对外开

放平台建设也逐步推进和升级。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贸易模式演进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参见图 1)。具体来看, 在出口导向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渐进性特征, 即存在一个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的过程; 而在高水平对外开放阶段, 制度型开放是其显著特征。制度型开放主要包括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大, 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但是制度差异依然是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改革方面也存在参与不足的问题。为此, 我国开始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从顶层设计出发”, 从政策创新转变为制度创新, 推动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 2013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 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全新阶段(聂新伟等, 2022)^[15]。基于此,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划分为“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改革开放的渐进性, 阶段的划分并无明显的特定的界限, 局部开放阶段大体为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全面开放阶段大体为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 制度型开放阶段大体为党的十八大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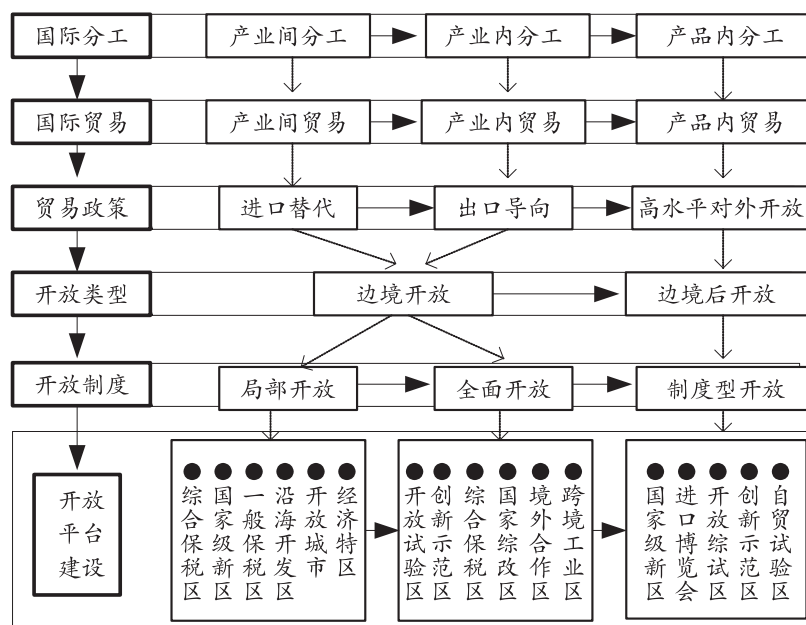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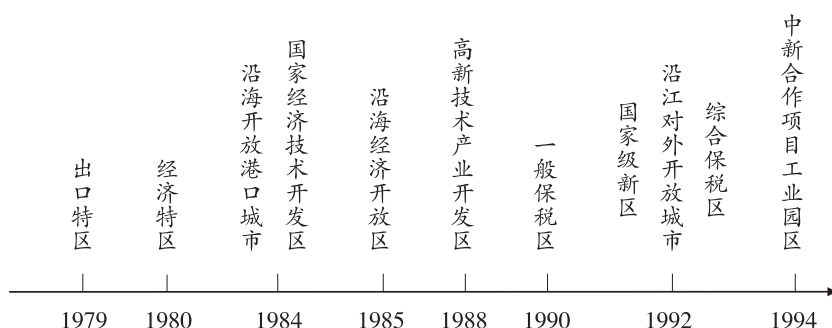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贸易逻辑示意图

1. 局部开放阶段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改革开放后, 我国开始陆续推动沿海城市优先开放, 通过建设经济特区, 开放经济口岸, 设立经济开放区、国家新区等, 打造局部对外开放平台。1979 年我国对广东、福建的对外经贸活动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1980 年进一步将两个省下辖的四个沿海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为经济特区; 1984 年开放上海、大连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建设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5 年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 建设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8 年设立海南省,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并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0 年开放上海浦东(上海浦东新区于 1992 年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新区), 在天津港等主要港口建设一般保税区。按照“两个大局”的思想, 随着沿海城市开放格局初步成型, 我国加快了沿江、沿边、内陆城市的开放进程。1991 年在东北地区开放了满洲里、丹东等四个口岸; 1992 年开始,

先后开放了一批内陆沿江城市、边境城市和省会城市, 并开始建设综合保税区。至此, 依托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城市开放和小尺度开放平台建设, 我国打造了一批经济特区、国家新区、综合保税区及开放口岸, 形成了多个增长极协同发展的局面,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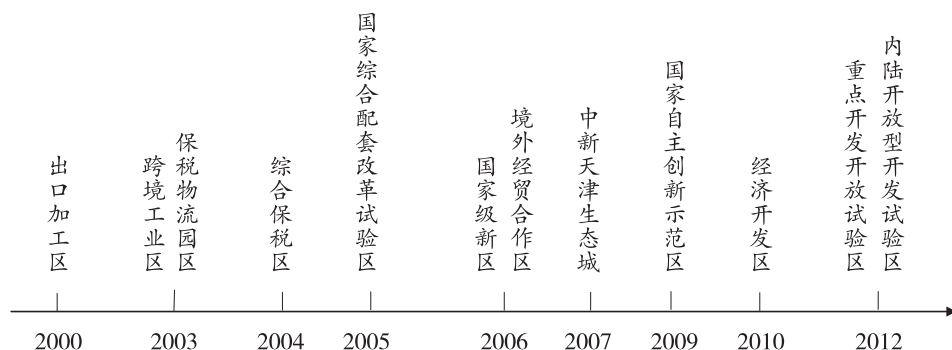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绘制。

图2 局部开放阶段的主要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2. 全面开放阶段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全面开放主要是相对于早期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区位选择性而言的。随着局部开放和出口导向带来的产业集聚度提升和对外开放水平提高, 我国开始通过全面开放和投资贸易并重来带动国内产业发展, 对外开放政策从早期的优先开放沿海地区过渡到更加强调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协同开放,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则更加注重统筹兼顾东中西部及内陆和沿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2000年, 我国逐步在武汉、成都等内陆城市设立出口加工区, 对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我国进一步提高沿边开放水平, 在广西东兴、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设立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促进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商贸流通, 并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同时, 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也进一步升级。在出口加工区、一般保税区等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和升级了综合保税区建设(参见图3)。综合保税区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功能于一身, 对打造完整的配套产业体系、加强金融及离岸金融支撑和促进高附加值业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其发展也取得显著成效。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 2021年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到5.9万亿元, 较2020年增长23.8%, 位居所有海关特殊监管区之首, 占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5.1%。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绘制。

图3 全面开放阶段的主要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3. 制度型开放阶段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在全面开放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也存在提质增效压力。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上人口红利的衰减和国际化水平的持续提升,我国对外贸易亟待从增量阶段转向提质阶段,而制度优势和改革逐渐成为最大红利和最大潜力所在。因此,促进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重塑,主动参与构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开放制度体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全面提速(徐唯燊,2021)^[9]。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制度差异导致的贸易摩擦制约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还存在多维失衡,如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不平衡,国内区际分工与国际产业链发展不匹配,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仍显滞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同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不足并存等。为此,我国开始从通过内部单方面的贸易政策创新促进对外贸易增长,转向通过完善贸易和开放制度体系推动对外贸易升级,进而以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全新的制度型开放阶段,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也取得显著进展(参见图4)。一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著,“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响应(杨艳红等,2018)^[16],为构建多元稳定的开放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多边合作,保障了我国国际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二是国家级新区和城市群建设加快重塑国内区域开放格局。为推动东中西协同开放,我国持续加强内陆、沿边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促进内陆、沿边地区对外贸易发展。2014年以来,先后在陕西、贵州、重庆、四川、湖南、云南、河北等地设立国家级新区。2016年,我国第一个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在贵州设立,并在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以及多个沿江、内陆城市进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这些举措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转移,构建内外联动、统筹发展的高水平开放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国内各地区对外开放平台全面提质升级。自2013年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体制机制障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开辟了地方政府良性竞争的新领域,各地竞相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培育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截至目前,国务院已经进行6批次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并印发了4批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有效发挥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引领示范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绘制。

图4 制度型开放发展阶段的主要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总体来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换是基于国内外市场关系变化的积极调整,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则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而升级。随着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促使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在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具有延续性和升级性,重点工作从扩大出口、扩大利用外资、推动对外投资等逐步转向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从而使“从扩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构成了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演进的主线^①。不同阶段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都与国家发展战略转换、国际分工及国际贸易转型、国内外市场变化等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有力统筹和有效谋划。

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空间演进及其空间经济效应

上文从时间维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其发展在空间上是非均衡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空间格局的演进以及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实践是在顺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探索推进的。国内方面,以积极化解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主线,按照“两步走”的空间战略部署,首先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再通过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从而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和产业合理布局。国际方面,在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包容共赢发展的道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开放发展新模式。

1.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空间格局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强调内陆城市要顾全大局,推动沿海城市率先加快开放,使拥有两亿人口的东部地区通过重点面向发达市场的开放快速发展起来;反过来,东部地区也要顾全大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帮助内陆地区发展。在“两个大局”思想的引领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均具有“从东部率先开放转向东西协同开放”的空间格局演进特征。

(1) 东部地区率先面向发达市场开放

改革开放前夕,世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明显提升,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为化解落后的生产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构想。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局部试点、逐步放开、相互带动的“两个大局”发展思路。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布局对外开放平台,主要服务于国家促进出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目标(林凡力,2022)^[17]。对外开放平台通过补贴、免税等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商投资,有效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逐步构建了从沿海到内地的要素扩散和产业升级辐射带动格局。同时,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改革外贸体制,逐渐减少外贸计划,将出口计划列明商品及指导性计划商品从3000多种压缩到138种(数据来自国务院1992年发布的《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二是下放外贸权力,将外贸权力从国家下放至各部委及省区市,并开始实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制,使得外贸企业数量激增;三是鼓励出

^① 这里的“扩大开放”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外开放平台设立的空间范围扩大,二是政策上侧重于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制度型开放”则强调开放制度体系的完善。因此,“从扩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反映的是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政策取向从主要追求开放的“数量增长”向更加重视开放的“质量提升”转变。

口创汇,推动海关、外贸管理机构、检验机构等协同,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强化关税的贸易调节作用;四是鼓励外资引进技术,推动购买设备与技术许可、特许经营、设备租赁相结合以及技术引进与企业技术改造相结合,外贸主体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外贸企业的经营主动性积极性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由于外商投资踊跃,技术溢出效应突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模式逐步从早期的“以出口创汇买设备”阶段过渡到“以市场换技术”阶段(夏梁等,2012)^[18]。但是,政策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域选择性,利用外资及扶持政策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2) 西部地区逐步面向周边市场开放

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东西部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内陆和沿海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在初步完成推动东部率先开放和发展的目标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推动内陆沿边地区加快发展,重点面向周边市场开放,促进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对外开放平台。对外开放平台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西部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极大改善了西部地区的贸易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国内的经济地理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但区际竞争加剧,地方行业结构同质性持续提高,部门条块分割依然存在,导致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等领域面临突出矛盾。西部地区在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发展口岸经济和通道经济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而东部地区则出现以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的倾向,导致区际分工失衡,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不畅,亟待构建国内外协同联动、合作共赢、高效安全的新型开放经济体系。

(3) 东西互济协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各地积极建设对外开放平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过程中,基于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同质化发展模式加剧了东西部的贸易竞争,既恶化了贸易条件,又不利于破除区际产业保护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影响了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从外部来看,国际经贸规则仍对我国参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科技合作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营造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尤为紧迫。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面临挑战和区际产业竞争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东西互济协同开放格局成为必然。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同时实施国内制度改革,以内外兼顾的方式深化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制度型开放也对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将各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和发展纳入统一的制度体系进行统筹规划,各对外开放平台之间也应形成互济协同开放的格局。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从东向西的梯度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平台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外开放平台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但地区间的不平衡依然显著存在,且存在同质化竞争的趋势;在新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快构建东西互济的对外开放平台网络格局,促进各地区的协同开放,进而在优势互补的竞合中实现整体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2.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塑造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空间选择对区域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定程度塑造了经济增长、经济扩散及对外开放的空间发展格局。

(1) 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在“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引领下,我国率先在沿海城市设立对外开放平台,逐渐推广至内陆地区。依托对外开放平台以及开放政策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形成了市场化开放机制,大量外资企业在东部沿海聚集,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外向度,形成了人口、资金、产业向东部地区持续汇聚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的主导,主要进行加工组装及技术研发,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原料及中间产品。这种国内分工格局又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通过集聚资本和人才形成的研发创新优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向东部地区集聚,而其他地区的产业竞争能力不足,贸易附加值低,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以东部地区为主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使我国迅速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但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由东部沿海地区主导(刘鹏等,2021)^[19]。通过引进外资和吸收国家政策红利,东部地区快速实现了区域技术革新、资本积累和市场拓展。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西部地区主要通过向东部地区提供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融入国内分工,形成了国内供应链对东部地区国际供应链的支撑。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参与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从国内区域价值链参与度来看,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截至2020年,东部地区仍保持着突出的工业发展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均较2000年明显下降,全国的工业集中度依然处于高位,四大板块的产业空间分化依然突出。

(2) 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空间增长格局

在东西部经济差异化发展和产业梯度转移推动下,各类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多点带动、多中心驱动的网络状空间增长格局逐步成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先推动沿海经济发展,在广东省、福建省两省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加速了沿海经济带的形成。1984年,扩大开放14座港口城市,实施减免税收、放宽信贷、下放外资项目审批权等政策和措施,积极推动外资引进,沿海地区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1985年,我国又进一步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59个县建设沿海经济开放区,继续推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随后又出台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推动东北沿海地带经济发展和协同合作,沿海经济带的辐射扩散力进一步提升。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大增长极快速崛起,成为我国重要的综合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

在沿海经济带的带动下,我国经济空间结构中的中心外围模式加速重构,四大板块深度互嵌、网状驱动的格局逐步形成。“八五计划”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开放、均衡发展,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各类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涌现,有效促进了区域融合及协调发展。我国四大经济板块都依托各自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具有以点带面效果的区域增长极,加快了多中心结构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空间极化与空间经济网络发育共进,多个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有机结合和共生,形成多极网络空间组织。近年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布局等重大战略的推动下,区域经济结构朝着多极网络空间组织方向加速演进,形成了一批驱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增长区、增长带、增长轴,网络式驱动的格局日益成熟,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空间组织基础(朱福林,2021)^[20]。

(3) 从同质竞争和贸易替代走向“双循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实施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优先目标。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

势急剧变化,我国在备战基础上强调地方经济自给自足,形成了第一轮地方经济产业的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张可云,2018)^[21],导致“大而全”“小而全”现象,市场分割初现端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在外向经济扩张和分税制刺激下,地方政府纷纷利用对外开放平台加大出口产业培育及招商引资力度,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剧了区际产业的同质化竞争,带来产能过剩矛盾,国内市场分割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基于对外开放平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以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的倾向,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陷入停滞。

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我国开始摒弃出口导向战略,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推动我国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更好服务于国内发展需求,为我国在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撑下实现以内生性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提供了有力保障(洪永森,2022)^[22]。而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对外开放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五、新时代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转型升级

前文分析表明,在对外开放战略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再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转换过程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经历了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从扩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构成了对外开放平台在政策和时间维度上的演进主线;而在空间维度上,与改革开放从东向西梯度推进相适应,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呈现“从东部率先开放转向东西协同开放”的空间演进格局;在功能上,对外开放平台则不断从单一(如出口加工区)向复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变和开放制度的演化,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开放格局,还推动塑造了不同阶段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发展阶段,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本身也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来实现转型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型开放也有不同的模式,因而本文在对制度型开放的典型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的若干路径。

1. 制度型开放模式与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开放制度是推动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开放制度设计都服务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关系等的不同,各国的制度型开放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包容性制度开放模式三种类型,并由此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策略和路径。

(1)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过程中,美国凭借其经济优势推行以国内规则为蓝本的制度型开放战略。在“本国为先”的原则基础上,美国通过制定高标准经贸规则,肆意设置贸易壁垒,实施贸易制裁,一方面将发展中国家锁定为低端供给来源国,另

一方面将潜在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近年来,美国的逆全球化政策取向更加突出,公开宣扬“美国利益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大肆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措施(杨立卓等,2022)^[23],造成了美国与经贸伙伴国的关系紧张。该模式以通过复杂的“长臂管辖”体系干预国际经贸的运行为主要特征,其制度开放的目标是输出美国制度,维持美国优势,保障美国利益,对多边主义国际治理机制形成巨大冲击,存在突出的单边主义倾向和历史局限性。为吸引国际投资和促进对外贸易活动,美国也积极打造对外开放平台,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设立特殊经济区,但相比于微观开放平台,美国更热衷于通过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方式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2)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日本和韩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和能力明显弱于美国,难以采取美国向外部强力推广本国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模式,因而主要通过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方式,以高标准经贸规则来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季建军,2021)^[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实行经济赶超战略,制度型开放主要以国际经贸规则为蓝本,强调政府干预,力图用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其核心是积极借鉴发达经济体市场制度和治理体系,通过与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签订多边、双边的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对外贸易,进而消解国内市场规模不足的约束。因此,日本和韩国的开放模式天然地具有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依附性,开放制度存在明显追随倾向。日本和韩国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更强调研发和技术创新,重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贸易对象以亚洲国家为主并辐射全球。日本的综合型科学技术园区、产业专门园区、服务业型园区以及韩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型园区和全球制造型园区,都是其以科技为引领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典型代表。

(3)以中国为代表的包容性制度开放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内在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长期致力于推动新型国际经贸关系的构建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我国始终支持并积极参与构建包容互惠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凸显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一是拥护多边贸易体系,顺应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始终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作斗争,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发展,推动国际经贸制度融合。二是改进对外经贸制度,优化营商环境,顺应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对宜商环境的要求,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经贸规则体系 and 市场体系。三是构建多维驱动的制度创新体系,在推动全面开放、系统开放同时,持续挖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潜力,因地制宜探索区域开放政策,打造功能互补、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平台,形成整体引领、局部驱动、东西并进、点线结合的开放格局。与此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综试区、境外产业园区等对外开放平台蓬勃发展,成为加快构建和完善制度型开放体系的重要支撑。

总体来看,相较于美国、日本及韩国,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开放平台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包容共赢、协调发展的价值导向,更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有利于实现内外兼顾和互利共赢。我国的制度型开放不仅在导向上奉行包容共赢的理念,积极构建区域性贸易网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世界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彰显了负责任贸易大国的时代担当;而且体现了自身的新时代特征,既能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赵伟洪等,2022)^[25],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又有利于立足国内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 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正在积极推进和持续深化。一是国际区域经贸合作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同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尹虹潘, 2018)^[8], 为推动我国深化内外联动、多区域经贸合作和探索制度型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二是不断放宽市场准入, 扩大对外开放, 持续减少外资准入限制, 修订市场准入清单, 积极扩大进口, 下调进口关税税率(尤其是关乎民生问题的医药、日用品等消费品税率), 显著提高了贸易自由化水平。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改善营商环境。打造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是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支点, 在全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平台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因此, 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原则, 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 进一步加快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充分释放对外开放平台的发展红利, 进而彰显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的显著优势,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1) 积极开展先行先试, 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以深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核心, 加强规制设计和管理优化, 制定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标准, 倾力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要持续推动开放制度创新,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重点, 积极开展开放政策压力测试和模式创新, 构建和完善开放制度体系; 继续推动简政放权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 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开放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要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高质量落地实施, 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全面推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AP) 谈判, 提高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和水平。进而, 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对外贸易更加便利化, 用更深层次、更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支撑对外开放平台的功能优化和效能提升, 依托“自贸区+试验区+创新区”等新型对外开放模式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

(2) 推动多区叠加和东西合作, 促进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对外开放平台发展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功能, 要推动各类对外开放平台多区叠加建设(任力, 2021)^[26], 深化横向协同联动, 利用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化解东西区域分化、市场分割和差距扩大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多区叠加, 要充分发挥类型多样、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平台的整体优势与合作效应, 推动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及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实现多区联动创新发展, 实现各平台之间的制度耦合协调, 通过叠加互补形成集成效应, 提升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的质量和效益。深化东西合作, 要鼓励东部援助西部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发挥东部地区平台的引领示范作用, 提升西部地区平台建设水平, 积极探索东西联合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路径。要通过对外开放平台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以平台共建共享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合作, 以制度协调融合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实现东西互促的区域协同发展(周绍东等, 2021)^[27]。

(3) 深化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当前, 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合作区、境外园区等多种类型的跨境经济合作平台。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有利于更好地对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推动对外开放平台的国际共建共治共享。在利用国内优势打造对外开放平台的同时, 要放眼全球, 积极与海外重要港口、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贸易平台开展跨境合作, 简化商品通关流程, 降低跨境贸易成本, 扩大境内外分工协作,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 促进资源要素自由高效流动。要构建和完善高水平的境内外双向开放制度体系,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打造面向境内外市场的产业集聚区和开放发展高地。要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 减少冗余成本, 促进信息互联互通, 完善跨境电商供应链, 打造跨境产业集群, 推动境内外对外开放平台实现联动协调、共赢发展, 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加快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 强化对外开放平台以点带面的功能和优势。新时代的高水平对

外开放要同时兼顾国外和国内两个维度,在促进对外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要发挥好对外开放平台对其他区域的驱动引领作用。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在总体上的制度型开放中具有试点、示范的作用,因而应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和推广,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平台的示范作用,有效推动整体制度型开放的不断深化,持续优化全国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进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激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对各种对外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成果进行复制和改进,全面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而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2] BALAGUER J, CANTAVELLA-JORDÀ, MANUEL. Structural change i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 for Spain(1961—2000)[J]. *Applied Economics*,2004,36(50):473-477.
- [3] KARUNARATNE N D. Export 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J]. *Intereconomics*,1980,15(5):217-223.
- [4] 简新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2022(10):58-65.
- [5] 陈传兴.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J]. *国际贸易*,2007(9):22-26.
- [6] 徐长生,庄佳强. 论出口、消费与产出增长[J]. *国际贸易问题*,2008(10):16-25.
- [7] 张鸿.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思考[J]. *国际贸易*,2005(9):4-9.
- [8] 尹虹潘. 国家级战略平台布局视野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J]. *改革*,2018(8):80-92.
- [9] 徐唯彙. 国际形势变化下南北协同开放路径研究[J]. *经济学家*,2021(12):81-89.
- [10] 李滨.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7):4-23+155.
- [11] 周天勇. 国内外形势变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2):174-180.
- [12] 苏科伍,马小利. 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辉煌历程——基于对外贸易视角的思考[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7):45-51+107.
- [13] 冯远. 分工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贸易思想[J]. *广东社会科学*,2007(6):24-29.
- [14] 丁小义,李佳欣. 双边贸易、产品关联与中国产品内分工升级[J]. *经济地理*,2022,42(7):106-116.
- [15] 聂新伟,薛钦源. 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测度评价及政策优化[J]. *区域经济评论*,2022(4):101-111.
- [16] 杨艳红,卢现祥.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5):12-20+162.
- [17] 林凡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开放的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2):11-16.
- [18] 夏梁,赵凌云. “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19(02):27-36+124-125. 20.
- [19] 刘鹏,夏炎. 我国各省增加值出口及其价值链嵌入研究——基于全球和国内价值链双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2021,No. 461(5):109-126.
- [20] 朱福林.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脉络、主要成效及高质量发展对策[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3):14-22+49.
- [21] 张可云. 国家区域企业有为的自主创新是中国富强之必选——理性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三维思考[J]. *西部论坛*,2018,28(5):73-80.
- [22] 洪永森. 从当前世界变局看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想的重要意义[J]. *财贸经济*,2022,43(9):19-22.
- [23] 杨立卓,罗姗姗,吴凡等. 双层博弈视角下中美经贸摩擦走势及应对策略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3):136-148.
- [24] 季剑军. 美日韩三国制度型开放路径比较及其启示[J]. *亚太经济*,2021(06):71-77.
- [25] 赵伟洪,张旭. 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历史逻辑与实践基础[J]. *经济学家*,2022(4):17-27.

- [26] 任力.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制度创新经验和前景——以福建省为例[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21(5):1-7+15.
- [27] 周绍东,张宵,张毓颖.从“比较优势”到“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42(1):123-130.

From Expanding Openness to Institutional Opening: the Evolu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Opening-up Platform

CUI Qing-bo, DENG Xing, GUAN S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opening-up platform b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major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asks, an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hina to promot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latform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itially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market by expanding exports to promoting the high-level open development, and China emerged as to become a world trade power. In this context,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China's opening-up platform has also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upporting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xploring an institutional opening system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With China's active explo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the advancement of various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the opening-up platform has gone through a phase from a "Special Export Zone" with a single function and two external ends to a "Free Trade Test Zone" carrying the function of system innovation and exploring system-based opening-up. This has created a new pilot field for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omestic industries, upgrade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hange the mode of trade development,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mainly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port substitution, export orientation, and high-level openness. Corresponding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 platform has also achieved the practical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partial opening, comprehensive opening,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 In the stage of import substitution, China's overall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i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and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decline and bottoming-out process, with limi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riven by the export-oriented strategy, China's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exports has continued to rise, reaching a high point and then turning back, largely reflect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tatus, and external demand shocks. In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stage, China's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reaching a low point and then turning to rise, reflecting the phased results of China's acceleration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oreign trade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rade competitivenes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trade

policy and the spatial cho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ing-up platform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hich has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river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a multi-center network spatial growth pattern,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model from the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trade substitution to double circulation. It fu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win-wi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scholars mostly focused on the logical sorting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opening-up platform.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opening-up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opening development goals is rare.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al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opening-up platform construction; secondly,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rade mode and spatial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pening-up platform; the third is to analyze the policy optimization of building a high-level opening-up platform in the future,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opening-up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in the new stage.

Key words: opening-up platform; a high-level of opening-up; institutional opening; opening-up patter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double circulation

CLC number: F125.1; F7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3)01-0042-17

(编辑:朱德东)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科技论文在线》《超星数字图书馆》《国研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博看网》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其中《国研网》为选择性收录),论文在本刊发表后将通过上述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上述或其他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西部论坛编辑部